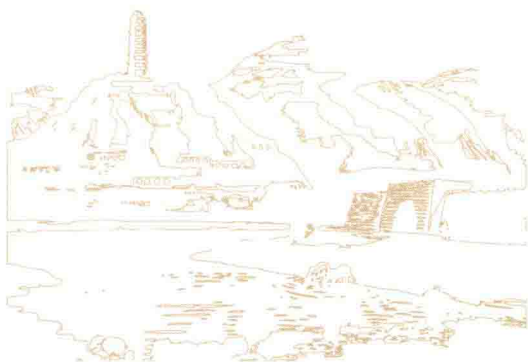


延安时期 党群故事



王健◎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延安时期党群故事

王健◎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时期党群故事/王健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98-2644-7

I. ①延… II. ①王…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1968 号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鹏

复 审:王世英

终 审:吴 江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mm×210mm 1/32

字 数:114 千字

印 张:5.1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644-7

定 价:12.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序 言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自然条件恶劣，地广人稀，生产落后。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执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边区政府和军队的财政开支，相当部分来源于外援：国民政府划拨的经费，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但是，1939年后，因天灾人祸的影响，边区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军队人数增加，脱产人员增多，农民税收加重，以致军民在生活中产生了矛盾。

尤其是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在经济上严禁国统区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军需品流入边区，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边区，使边区对外贸易几乎断绝。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又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致使整个外援全部无法汇兑。

财源枯竭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当地人民身上。1939年前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额不过1万多石，1939年猛然提升到了5万多石，1940年，边区政府不得不计划征粮10万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20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20倍。随之，边区出现了党群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军队纪律有所松懈，不尊重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地方上一些干部群众把军队利益

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对军队漠不关心，遇到纠纷时，不责己，只苛求政府。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驻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汇报说，战士向老百姓借锅，有的老乡不借，还把锅沉到水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里做饭，老百姓把烟筒堵起来。1940年的一次座谈会上，留守兵团的一些领导说：“老百姓越来越凶了，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地”，“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我们去见毛主席”，等等。1941年秋，还发生了三五九旅的两位排长与延长县大队在县政府院内互相冲突的事件。还有军队为解决住宿修建房屋占了农民的平地，很让农民受损失；运盐时，部队用公家骡马，费用少，成本低，老百姓用自己骡马，费用多，成本高；部队开旅社和骡马大车店，吃的是公家饭，收费低，而老百姓开的旅社和骡马店，吃的是自己饭，收费高，故住的旅客比部队少；军民为了生产占荒山也常常引起纠纷。军队人员增多，民众负担加大，形成了“鱼大水小”的状况；军民矛盾逐渐加剧，核心是对生活利益的争夺，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怎么解决好这个矛盾，成为摆在党的领导人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听到老百姓对他的咒骂声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进行了调查研究，做了妥善处理，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广纳党外人士之谏，与周围的农民交朋友；从关心群众吃水、看病、生孩子、看戏等小事入手，带头贯彻群众路线；在领袖人物带动下，大批领导人率先垂范：有时刻把群众利益挂在心上的周恩来、朱德；有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的董必武；有“亲切有如家人父”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有“与民谋利更孜孜”的谢觉哉；有被群众称为“马青天”“王善人”的马锡五、王维舟；等等。一批批典范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维护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陕北人民终于发自内心地唱出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东方红》。

不仅如此，为了从根本上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军队在生产中，为了不与农民发生耕地冲突，大多在郊外荒地屯垦，战士自己搭草棚、挖窑洞、打造农具、购买耕畜。军队开办的纺织厂、鞋厂、肥皂厂等工厂出产的产品，向当地老百姓供应。农民在生产技术上和军队官兵交流，取长补短。军民在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中互相帮助，改善了生活、繁荣了市场。军队做到自产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压力，改善了军民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同声称颂：“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这样的军队？”

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当时李维汉说它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进一步阐明了党绝对不能脱离群众的深刻道理。他还在给中共葭县县委题词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延安时期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也是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一种好的工作作风，从而确立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本书主要是叙述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与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故事，故事虽小，但内容很真实，也很感人，细节之中折射出革命先辈的人格魅力。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用生动、感人、鲜活的“典型故事”辅助党员干部学习，希望能对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境界，加强党性修养有所启迪。

作 者

2014年5月

目 录

听到咒骂之后 / 1

广纳党外人士之谏 / 8

《甲申三百年祭》是怎样被列为整风文件的 / 16

一口“红军锅” / 25

谢觉哉：“与民谋利更孜孜” / 28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 34

“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 / 41

董必武：为六角钱写检讨 / 45

李有源与《东方红》的诞生 / 53

孙万福与《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 62

枣园乡一户特殊的居民 / 68

幸福渠水流不尽 / 76

让群众坐在前头 / 80

毛泽东和他的农民朋友们 / 85

让儿子去上“劳动大学” / 91

毛泽东与劳动英雄杨步浩 / 100

张思德与《为人民服务》 / 107

群众叫他“马青天” / 115

陇东出了个“王善人” / 122

延安“包公”雷经天 / 127

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 133

延安窑洞话民主 / 137

时刻把群众利益挂在心上 / 144

铸造人民的铜墙铁壁 / 148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 153

听到咒骂之后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这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突然，一声重雷震耳欲聋，雷电径直穿入会议室内，到会人员都受到巨雷震动，头晕目眩，慌忙奔向室外。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因触电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这天正逢集市，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一位50来岁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大雨，他拴在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木桩上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又骂娘，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边哭边数落着：“老天爷瞎了眼，为甚不让雷公打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周围赶集的老乡们一听都吓了一跳，有人赶紧上前劝他，制止他的哭骂。

然而，老汉的话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延安城。顿时，街头巷尾传言四起，有反对的，有同情老汉的，也有借题发挥的。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老汉抓起来，也有人建议及时汇报党中央，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雷电击死人，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没有什么奇怪的。可街头为什么那么多传言呢？有人说：

“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一时间，议论纷纷，毛泽东觉得里面有问题，他立即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

边区保安处的周兴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周兴，用极其亲切的语调说：“听说你非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呢？”周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在大庭广众下侮辱您。”“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周兴情绪激动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接着说：“李县长是中了雷电死的，与主席有什么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您，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您。我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说：“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不，您是人民的领袖。骂您，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

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毛泽东又笑着对他说：“你想过没有，真的特务汉奸敢在光天化日下骂我吗？”

周兴一怔，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起身走到周兴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问道：“周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周兴痛痛快快地回答道：“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接着说：“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吗？”

周兴还想辩解，说：“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毛泽东轻轻一笑说：“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周兴不再吭声。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周兴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拘留那位老乡。但是请你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周兴爽快地答应了。

周兴走后，毛泽东陷入沉思，作为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喜悦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老乡究竟有什么情绪，以至于当众骂人呢？

原来，问题出在边区政府内部。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同时，国民党对边区层层包围封锁。另外，从1939年至1941年，边区每年都遭受水、旱、虫、冰雹等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这就给边区政府增添了困难。几年中，边区军政人员明显

增加，全边区非生产人员相继增加到10万多人。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边区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负担过重，既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出现不少牢骚和怨言。

几天后，周兴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这些情况。毛泽东紧皱眉头，听周兴接着说：“抗战初，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20万石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毛泽东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噢，原来是这样！”他思索片刻，对周兴说：“看来，这位老乡确实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

周兴点点头，由衷地笑了。

毛泽东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指示西北局组成一个考察团，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随后向中央作详细汇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后，指示边区政府减征公粮。最后决定减征公粮4万石。

此举一出，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那个骂人的老汉也悔恨交加，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是俺错了！是俺错了！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骂毛主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将边区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当时，延安县的征粮任务比较重，征收公粮任务完成后，延安县委书记就到几个乡去做了调查，写了一篇《救国公粮完成以后，对群众生活影响怎样》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以充分的理由说明，群众能负担得起。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很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不久，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根据这个号召，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队在陕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不少机关和部队生产的农副产品达到了自足或半自足水平，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事后，毛泽东又说：

“既要同群众商量，又要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减征公粮之后，边区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兵简政，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但是，一些地方救国公粮任务仍然很重，有些地方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

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又叫来了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毛泽东要了解情况，指示钱益民：“把骂我们的那个伍兰花带来，我要亲自问话。”

伍兰花到了会客室十分害怕，她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命可能都保不住了。见了毛泽东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劝她说：

“你不用怕嘛！请坐，坐呀！先吃几个枣吧。”伍兰花战战兢兢地坐下来。

毛泽东和伍兰花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伍兰花家里的情况。伍兰花家里共有6口人，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还不到3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住的两孔窑洞临近水沟，水一涨就淹了。家里没钱，也没有劳力打孔新窑洞。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5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这几年，前去征粮的县、乡、村干部不少，有些人不顾她的实际情况强行征粮，甚至骂人。伍兰花忍不住也就大骂共产党，骂毛泽东，结果被抓起来押往延安，边区保安处准备审讯后予以惩治。

说着说着，伍兰花掩脸痛哭起来。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毛泽东还亲自接见她，同她亲切地拉家常。她感到十分内疚，说：“毛主席，咱不对哩，咱不应该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吧。”

毛泽东正要劝她，只见她双腿一跪，求毛泽东处罚。

毛泽东连忙俯下身，双手扶起伍兰花，说：“你不用难过嘛！我们不会枪毙你的。我已批评了清涧的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嘛！你骂了政府，被捉来了，我今天同你谈谈，你不用害怕，要对我讲真心话。”

伍兰花见毛泽东态度诚恳，也就放了心，她擦干眼泪，一五一十地把实际情况说了出来。毛泽东听罢十分气愤，半晌不语。伍兰花试探着问：“主席，咱讲完了，咱只求你看在3个娃娃

的份上，把咱早些放回去，行不？”毛泽东满口答应：“行！行！”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指示说：“这位伍兰花，马上放人！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这位同志没有什么罪过，这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实行具体特别照顾。同时，清涧的公粮负担问题，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要做一次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还有，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做出深刻反省，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的官员，进行一次审查，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这件事得到了妥善处理。

毛泽东在责骂声中心明似镜，目光敏锐。他的这种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吸取有益的东西，用以改进工作的做法，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戴。

广纳党外人士之谏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这位个头较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李鼎铭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境贫寒，可他发奋苦读，博览经史子集及医学经典著作，精于史地、数学，喜爱研究天文气象，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造诣较深。他先后创办了米脂县国民小学和桃镇国民高等小学，并曾任教于榆林

中学。西安事变爆发后，李鼎铭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从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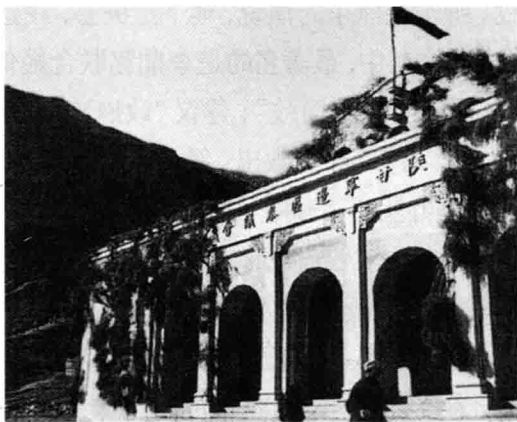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如何团结广大民众，振奋精神，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任务。在这种形势下，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于11月6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开幕了。



◆延安时期的李鼎铭

为了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以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边区参议会是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设立的人民参政机构。它是边区人民参与国事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共21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在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权建设纲领中规定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即边区政府负责人中共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因此，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现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也在延安隆重开幕了，参议员中，既有满身油污的边区工人，也有身披老羊皮袄、头扎白羊肚手巾的农民；既有一身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也有穿着边区自织的粗布制服的机关工作人员；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家从不同的岗位上走来，欢聚一堂，争献抗日救国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